

社會與國家

石 英 譯

1. 階級對立底不可融協性之產物的國家

在他們的爲解放的鬥爭中，被壓迫階級底革命的思想家和指導者底學說在歷史上所反覆地受過的運命，現在正在馬克思的學說裏生起着。壓迫階級對於偉大的諸革命家的方法，在他們的生存中，是不斷的迫害，對於他們的學說亦以極野蠻的憤怒，狂妄的憎惡，無羈絆的虛偽及譏謗的戰術去抵抗的。至他們死去了以後却做作一種企圖。其目的在於使他們變做一種沒有禍害的偶像，使他們列於聖人之中；允許他們的名字有一定限度的榮譽去當作“慰藉”及欺瞞被壓迫階級之手段，但這裏決不忘却使革命的學說的內容洗滌乾淨，牠們的革命的銳鋒化做遲鈍，把牠們變作模稜無角的企謀。馬克思主義底這樣的“再鑄”現在正是布爾喬亞派和勞動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者互相一致的地方。他們忘却，抹消，歪曲這學

說底革命的方面，即牠的革命的精神，他們把布爾喬亞派所能接受的或他們似乎能够承認的東西押出於前景，且從而贊賞之。一切的社會愛國主義者現在都是“馬克思主義者”了。——（不要說笑話！）昨日還是以根絕馬克思主義為專門的德國的布爾喬亞學者們現在頻繁地說着“爾民的德意志”的馬克思，說他的殖民地教育了為指導掠奪的戰爭而光輝地所組織的勞動組合。

在這樣的舉情之下，我們當面着馬克思主義底曲說變得了時代未聞的流布之際，那末我們的任務就是首先在於恢復那真實的馬克思的國家論。為這個恢復，有從馬克思及昂格思的原著作中引用全系列的很長的引證之必要。很長的引證對於敘述當然有一種鈍重之弊，而且對於牠的通俗化是沒有效能的。但沒有引證是絕對不能完成這個任務。為使讀者對於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建設者之全見解及此等見解底發展能夠下一個獨自的判斷起見，又同時地為文書地去證明並明瞭地去指出現時正在流行中的“哥芝基主義”所作為的改惡起見，關於國家問題之馬克思及昂格思底諸著作中底全部，至少他一切有決定性的章句不得不被無條件地，儘可能而完全地引用出來。

我們以昂格思底最普及的著作“家族，和有財產及國家底起源”一書作我們的開始。本書於一八九四年在胥士特格德（Stuttgart）已經出了第六版。

“所以國家”，昂格思當他的歷史的分析的總括之際說着，“決

不是從外部去強制社會底權力；也不是黑格爾（*eger*）所主張的。牠是道義，理念的實存性，或理性底姿態及實存性，事是一定的發達階段的歷史底產物。牠是一種告白，即社會陷入於牠自身不能解決的矛盾，分裂於不能融和的對立，且無除去這對立之力量的時候所發生的告白。然而這對立，即經濟的利害上互相抗爭的諸階級，爲不使自己及社會滅亡於無益的鬥爭，於是應有一種表面上立於社會之上的權力去防止軋輾而鞏押於‘秩序’的框內的必要。而此出自社會底，但超越於社會底，應次越疏離於社會底，權力就是國家。”（德皇第六版第一七七至一七八頁）。

關於國家底歷史的任務及其意義底問題之馬克思主義底基本思想是在此地用極充分的明析而表現出來了的。國家是階級對立底不可融協性（*Unversöhnlichkeit*）底產物及其表白。國家是對應於階級對立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程度，客觀地不能融協之時，在這地方，這時候，這一個程度裏所發生的東西。因而反對地，國家底成立是證明階級對立到了不能融協的事實。

馬克思主義底偽造正就開始在這個最重要的也最根本的點上。而這偽造向二個方向運動着。

一方面是布爾喬亞的，尤其是小布爾喬亞的觀念論者在不能爭辯的歷史的事實底壓迫底下不得不承認：國家只能存在於有階級對立及階級鬥爭之處所；但他們這樣地去“修正”馬克思，——即以國家爲一個階級融協之機關。照馬克思，假若階級底融協是可

能的，那末國家就不能形成，也不能持續下去。在小布爾喬亞的，凡俗的教授及著述家則國家恰只有用於階級底融協——他們雖不斷地以好意去論及馬克思！照馬克思，國家是階級支配底機關，由一個階級去壓抑某一階級底機關，是強固化及合法化這壓抑，且由此去防止階級底軋轉的“秩序”之產物。依小布爾喬亞的政治家底見解，則所謂秩序正是階級底融協，且不是由一階級去壓抑他一階級，在他們所謂防止相互的衝突就是意味着融協，而不是意味這正是從被壓迫階級的手中奪取了為顛覆壓迫者底特定的鬥爭手段及其方法。

一切的社會革命黨員(S.R-s)及孟塞維克例如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之際，關於國家底意義及其任務的問題當作一個急速的行動看，而且當作一個大眾的行動看，而以全幅的意義實踐地發生於我們的面前之時，他們都突然地陷落於“由國家”而“融協”階級底小布爾喬亞的理論了。這兩黨的政治家底無數的決議和議論徹徹底底被這小布爾喬亞的及凡俗的“融協”理論所浸透了的，小布爾喬亞的民主主義者決不能理解國家是特定的階級，即不能與其對虐民(與牠相對立的階級底)融協的階級底支配機關之事實。對於國家的這樣的態度是我們的社會革命黨員及孟塞維克，要之全然不是社會主義者(我們布爾塞維克常常要想證明這事)而是一種有社會主義的成句集的小布爾喬亞的民主主義者之最顯明的證據之一。

在他一方面，有哥芝基主義之馬克思主義底更精密的歪曲。

“理論地”國家是階級 配底機關，又階級對立是不能融協 這些都不能插入異議，但次述的事實却被他們所看過或扮飾了：若國家是階級對立底不可融協 之產物，若牠是一種權力，且這權力超立於社會之上而“漸次地疏離於社會的，”那末，被壓抑階級底解放不但沒有暴力的革命，而且若不破滅那支配階級所創造的，且體現着此“疏離”的，國家權力底機關，是不能成功的是很明白的了，如我們以下去想論述的，馬克思早把這個自明的結論非常正確地從革命底諸任務的具體內，歷史的根據中抽了出來了，而哥芝基，我們將此更詳細地在後面的敘述中去證明吧恰好“忘却”及偽造這個結論。

2. 武裝的人們的諸團體，監獄等。

“相反於古昔的氏族社會”——昂格思接續地說——“國家第一是以領土去區分其國民為特徵的”……。

在我們，這個區分好像是“自然的，”但這個區分對於由種族及家系的古昔的組織却要有激烈的鬥爭。

“……第二的特徵是已經與當作武裝自己的權力而組織了的住民不能直接地一致了的，公的權力底設置，這個特殊的公的權力因從分裂於諸階級以來，住民底自主的武裝組織已經不可能的了，所以有必要的，……這樣的公的權力存在於無論那個的國家，這權力不但由武裝的人們而成立的，而且還從氏族社會所毫不曉得的物的附加物，監獄及一切的種類的強制的設備而成立的”……。（一

七八頁)

昂格思把人們所稱謂國家的這“權力，”，即發生於社會底，但超越於社會，且漸次地疏離於社會底，權力底概念發展起來了。這權力首先存立於什麼東西之中呢？存立於能支配監獄等的武裝的人們底特殊的諸組織之中。

我們說着關於武裝的人們底諸部隊是有正當的理由的，因為固有於每個國家底公的權力與武裝的住民，他們的“自主的武裝組織已經不能直接地相一致了。”

像一切的偉大的革命的思想家一樣的，昂格思想把有階級意識的勞動者底注意導向到下述的事實去，——即使他們注意那鄉愚風的俗物主義以為毫無注目的價值的，最通常的，不單是很堅固的，而且因化石了的偏見而看作神聖似的事實。常備軍與警察是國家權力的主要武器，但……這還能成為其他的東西麼？

從十九世紀末的歐洲人——這是昂格思向着說話的人們——底大多數的——他們連一次都不曾經驗過大革命，也不曾接近地去觀察過的——立腳點講，他是不能成為其他的東西的。住民的武裝組織本來是怎樣的東西，他們是全然不能理解的。對於這特殊的，超越於社會之上而疏離於他的武裝的諸部隊（警察、常備軍）為什麼的目的纔成為必要的問題，西歐及俄羅斯的俗物老喜歡用斯賓塞（Spencer）或米開羅微斯基（Michajlowski）處借來的二三的語句，即以公的生活底錯雜性，諸機能底分化等類似的底指示去對答而已。

這樣的指示好像是“科學的”似的，且能有效地使普通人睡覺的；然而他把最重要而最根本的事實——即社會分裂於相互地不能融協的敵對的階級之事實文飾了。

假若沒有這個分裂，那末“住民底自主的武裝組織”因其複雜性與其技術底完成等必能與弄棒頭的猿羣或原始人或民族共同體底原始組織區別出來的吧，但那樣的組織（——按即指常備軍警察等的公的權力——譯者）是不可能的了。

因為文明的社會分裂於敵對的，又且是不可融協的敵對的階級，這階級底“自主的”武裝是會惹起階級間之武裝的鬥爭，所以上述那樣的組織是不可能的。於是國家形成了，特殊的權力亦被創造出來了，而武裝的人們底特殊的組織亦告發生了。各個的革命都明白地指示我們下述的事實：一切的革命把國家機關顛覆了的時候，支配階級如何地想再興有用於自己的武裝的人們底特殊的諸組織，及被支配階級如何地想創設一種不是有用於擄取階級而是有用於被擄取階級的新的組織。

昂格思在上記的敘述中理論地提起這樣的問題，——即與一切的大革命實踐地，具體地，更且在大衆的行動底規模裏所提出給我們的同樣的問題：就是武裝的人們底“特殊”的諸組織對於“住民底自主的武裝組織”底關係之問題。歐洲及俄羅斯的革命底諸經驗對於這個問題提供了怎樣的具體的證明，我們將在後面去觀察。

我們且再歸到昂格思底敘述吧。

他指摘這公的權力，譬如在北美洲的此處彼處，有時是微弱的

(這是關於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是稀有的除外例，祇關於那自由移民佔着優勢的，前帝國主義的時代的北歐洲底部分的)，但一般地言之，則此公的權力是在強大中。

“牠(公的權力)可是隨着國家內的階級對立愈加尖銳化及隣接的國家及人口意見增大而強大起來的。——我們只要看現在的歐洲因階級鬥爭及征服競爭把公的權力提高至有併吞全社會及國家的氣勢的就可知道了……。”

這是早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的開初時所寫的東西。昂格思底最後的序文底時日是一八九一年六月六日。當時向帝國主義的發展——即托辣斯底完全的支配及大銀行底萬能，更加那大規模的殖民地政策等等的意義的帝國主義——纔在法蘭西始行開始起來，而在北美及德意志則尚是非常微弱的。自此以後，“征服競爭”成就了很長足的前進，尤其至二十世紀的開初十年代之初，地球已被這等“競爭的諸征服者”即大掠奪國家之間終局地分割盡了。自此以後海陸軍備無制限地擴張了而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的掠奪戰爭是為英國或德國去支配世界的，為分割掠奪物的戰爭，這掠奪戰爭使全社會力“併吞”於掠奪的國家權力之中而遭遇了那完全的一大破滅。

昂格思在一八九一年已經曉得去指示那“征服競爭”是諸大國家所用的外交政策中的最重要的特徵之一；然而社會愛國主義的賤奴輩則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七年正當這數倍地尖銳化了的競爭使帝國主義戰爭勃發起來的時候，却用“防衛祖國”及“擁護共和

國及革命”的言辭去掩護“他們”的布爾喬亞氾底掠奪的利益！

3. 掠取被抑壓階級底的手段之國家。

爲維持特殊的，超越於社會之上的公的權力，於是租稅與國債乃爲必不可缺的東西了。

“掌握了公的權力和租稅課賦權”，昂格思寫着，“於是官吏乃當做社會底機關而立於社會之上。對民族制度底諸機關所表示的自由，樂意的尊敬不能使他們滿足了，——縱令他們能夠得到這樣的尊敬，從社會疏離出來的權力的所有者的他們務需要有特別法來尊敬他們，而由這特別法之力他們享受特別的神聖性及不可侵犯性。雖最蹙脚的警官亦享受比民族社會底一切的機關所受的更大的權威，但文明社會底最有力的公侯與最偉大的政治家或將軍亦將羨慕那最小的民族之長，因他受着沒有強制的，不能爭論的尊敬’。

當作國家權力底機關的官吏底特權的地位之問題在此開始了。爲什麼使牠立於社會之上的問題當作根本的而描寫出來了。我們將看察：這理論的問題如何地在一八七一年由巴黎公盟而實踐地解決了並在一九一二年如何地被哥芝基反動地所抹殺粉飾了的事實。

“國家雖由有抑制階級對立之必要所發生但同時發生於階級對立的正中，所以，通常國家是最有力的經濟地支配着的階級之國家。這種階級依他們的國家之力又變成政治地支配着的階級 又因

此獲得了抑壓 榨取被壓迫階級之新手段”。……不但古代的國家和封建國家是利用和虐使奴隸及農奴，即“近代的議會制度的國家亦爲由資本去榨取勞銀勞動底器具。但是例外地有這樣的一時期，即因互相鬥爭的諸階級保持着均衡，一時地國家權力當作一個外觀上的調停者而獲得某一程度的獨立性。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的絕對王政就是這種性質。法蘭西的第一並第二帝國底波拿巴特（Bonapartismus）主義亦是如此；個國的俾士麥亦然”。

而——我們這樣地附加——俄羅斯共和國之克林斯基（Kerenski）政府亦不外是如此的；即委員會因小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者底指導而變成無力了的，一方面布爾喬亞派又沒有簡單地把這委員會解散起來的充分的強大的力量，在這狀態之時，開始了迫害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以後的克林斯基政府就是這種性質。

“財富間接地，但更確實地，行施其權力於此地（即民主主義的共和國裏），而且第一在“直接的官吏腐敗底形態上（美利堅國家）”，第二在“政府與交易所底同盟上（法蘭西及美利堅）”。

現在帝國主義和銀行底支配在各個任意的共和國早把防衛并實現化財富底萬能力之這二種方法發展到極熟練的程度了。例如俄羅斯的民主主義共和國之最初的數個月，即所謂“社會主義者”——社會革命黨員及孟塞維克們——與布爾喬亞派底新婚蜜月，聯合政府的巴爾金斯基（Pa tshinski）已經妨害了那一切的規則——取締資本家及其盜路，即他們以供給軍隊爲名去掠奪國庫的諸規則；——之勵行了。其次當資本家以一個小地位及年俸

十二萬盧布去酬報那辭職了內閣的巴爾金斯基（他當然被與巴爾金斯基完全地相同的人物所代替了的）的時候，——我們將稱此爲什麼東西呢？直接的買收呢還是間接的呢？稱此爲政府與新地嘉特富豪（Syndikatsbaron）的協約呢還是“單單的”友誼關係？邱訥夫（Tschernou）與再列梯爾（Zeretell）奧克仙且夫（Awxentjeu）與斯可培列夫（Shobeleu）究竟擔當了怎麼樣的任務呢？他們是掠奪着國家的百萬富者之“直接的”同盟者呢還單單是間接的呢？

“財富”底萬能力在民主主義的共和國裏是比較更確實的，因爲這萬能力可不必去依賴那資本主義底惡劣的政治的外殼。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是資本主義所能思維出來的最良的政治的外殼，因而資本從獲得了（由巴爾金斯基 邱訥夫，再列梯爾商會底媒介）這最良的外殼以後，將牠的權力確實地，堅固地樹立起來，使這權力決不因市民的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底人物，政府或黨派之交替而生動搖。

又昂格思極確定地命名普通選舉法爲布爾喬亞派的支配底工具是應該喚起注意的地方。明透地觀察了德國照會民主主義底長年的經驗之後，他說“普通選舉法是‘勞動者階級底成熟之計度器。在現今的國家裏普通選舉法沒有這以上或這以下的意義。”

像我們的社會革命黨員及孟塞維克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和他們的可愛的兄弟們即西歐的社會愛國主義者及機會主義者，對於普通選舉權却期待着“以上”的意義 他們共有着下述的誤謬的見解，且注入這誤謬的見解於國民之中，——即他們以爲在

“現今的國家裏”勤勞的住民底大多數的意志可以現實地表白出來，而且可以保證這意志的實行。

我們現在祇能將這虛偽的見解指摘出來，祇能指示那完全地明瞭，精確而具體的昂格思的解釋步進步地被“官許的”（即機會主義的）社會黨底宣傳及煽動所歪曲之事實。至於昂格思所棄却的這種見解底完全的誤謬性之詳盡的揭露當在關於“現今的”國家底馬克思和昂格思的意見之後面的敘述中發表出來。

昂格思在他的最普及的著作中總括他自身的意見於下述的數語之中：

“所以國家不是萬劫的古昔就存在着的東西。曾有過無國家的，對於國家及國家權力毫無預感的，社會。在與社會分裂於階級時必然地相關連的經濟的發展的一定的階段上，因這分裂纔有國家的必要。我們現在以急速的步武走近不但沒有這樣的階級底存在之必要的，而且階級底存在已做了生產之積極的妨害的，生產底發達階段。與以前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的同樣地，階級必歸消滅，同時國家亦不可避免地必歸於消滅之一途。在生產者底自由而平等的結合之基礎上從新地去組織生產的社會必會將國家機關移置於那時候牠所應去的地方；——即移置於古代的博物館之中，和那紡車及青銅之斧相並地。”

我們在現今的社會民主主義底宣傳及鼓動的文書中不常常遭遇這個引用文。即不然，縱令我們遭遇了這個引用文，也差不多不過是當作一種對於聖像的禮拜之手段，即崇拜昂格思底公式的表

白而已，對於移置全“國家機關於那時候牠所應去的地方——即古代博物館之中”底一句話予想着如何偉大的革命底飛躍是沒有想去熟考默慮的什麼企圖。即能理解昂格思當作國家機關所指示的東西也罕有其人。

4. 國家底“死滅”及暴力的革命。

關於國家底“死滅”之昂格思的文句是很周知的，常常被人引用的，而且能明白地表示出馬克思主義被機會主義所歪曲的全本質，所以我們對此有詳細地論述之必要。現在我們將這文句所出的全敘述引用出來：

“普羅列塔利亞特攫取國家權力而首先地使生產機關轉化到國有財產。但是，普羅列塔利亞特由是揚棄他自身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性質，由是去揚棄一切的階級差別及階級對立，更去揚棄國家的國家性。從來的運動着於階級對立的社會有國家的必要，就是當該時代的榨取階級為維持其生產的外部條件要有組織因而為強力地壓制被榨取階級於現存的生產方法所賦與的壓制條件之下，即奴隸制度，農奴制，勞銀勞動制——要有一種組織。國家是社會全體的公的代表，亦是結束社會於一個可見的團體；但是，這只說國家不外是一種代表當該時代的全社會底階級之國家，就是，在古代是奴隸所有者的國家，在中世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現代是布爾喬亞的國家。但是最後國家事實地做了全社會的代表者的時候，就是國家自變贅物之時。一經絕跡了應被壓制的社會階級以上，一

經排除了支配階級及根基於從來的生產之無政府狀態而起的個人的生存競爭，又由是所發生的衝突與奢侈以上，那末，已經沒有了被鎮壓的東西。所以沒有特殊的鎮壓力即國家的必要了。國家當牠真實地爲全社會的代表者而出現時所取的第一行爲——以社會之名去佔有生產機關之行爲，——同時就是國家如寔的最後的獨立行爲。對於社會的諸關係的國家權力底干涉由一領域至他領域地漸成無用，終至自歸消滅。對人底支配變到事物底處理及生產過程底管理。所以國家不是被人廢止，却是自己死滅。“自由的人民國家”這句話，無論照牠的一時的，鼓動的資格，或牠的究極地在科學上的不充分性應該由上述的理由去評定的；又所謂無政府主義者的要求國家在今明兩日之間立當廢止一事，亦同樣地由此可以評定。”——丟林君的科學的變革 三版，1894，三〇一至三〇三頁。

我們可以沒有誤謬地說，在這顯著的富於含蓄的昂格思的考察中，爲現今的諸社會黨底社會主義思想之現實的共有財產的祇是這樣的見解：——反於“廢止 國家之無政府主義者的教義，依馬克思則國家是“死滅”下去的見解而已用這樣的方法去改削馬克思主義實不外使牠變至機會主義而已，因爲在這樣的“解釋”裏祇殘留着那緩慢的，均等的，漸次的變革底，缺乏飛躍與動亂底，革命底不成立底，曖昧的概念而已。在國內的，一般地普及了的意義，——假使可以說是大衆的意義的——國家底“死滅”，縱不是完全地否認革命，却無疑地在文飾革命。

加之，這樣的解釋是最粗雜的，祇有利於布爾喬亞派的馬克思

主義的曲解，而這曲解理論地却基立於我們已經引用了的，昂格思自身所要約的全敘述中所包含的最重要的條件與熟慮之誤認。

第一，在這考察底劈頭，昂格思這樣說着：普羅列塔利亞特由掌握國家權力“更去揚棄國家的國家性”。去思索這本來有何種意義是不曾“慣行的”。通常不是將此完全地無視，就當作昂格思底“黑格爾流的弱點”之一種去說明。但事實上怎樣呢？在這等辭句之中却簡潔地表現着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中之最大的底經驗，——即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盟的經驗，關於這個經驗我們當在別處詳細地來說。實際上昂格思在此所說的是由普羅列塔利亞特底革命去“揚棄”資本家的社會，至於關係死滅這句話却是關係於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的普羅列塔利亞國家機關的殘餘。依昂格思則資本家的國家不是“死滅”，却是被革命中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所“揚棄”。這革命以後，普羅列塔利亞的國家或半國家纔能死滅。

第二，國家是“一特殊的壓抑的權力”。昂格思在這裏用充分的明哲下了這有光彩而高深的定義。照這定義則可將下邊的結論，即布爾喬亞汜為抑壓普羅列塔利亞特所設的——即由多不盈握的富者去抑壓幾百萬的勞動者的，——“特殊的抑壓權力”必需要由普羅列塔利亞為抑壓布爾喬亞汜而設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特殊的抑壓權力”來置換的。（即無產階級（普羅列塔利亞特）底專政）而國家的國家性底“揚棄”正是成立於此的。所謂“由社會之名去佔有生產機關”底“行為”也成立於此。所以這是很明瞭的，這一個的（即資本家的）“特殊的抑壓權力”由其他一個的（即無產者階級的）“特殊

的抑壓機關”底置換決不能接續於“死滅”的道路。

第三，關於“死滅”，或更立體而濃色的“就眠”這句話，昂格思所說的是明白且確定地關聯於“由國家以社會之名去佔有生產機關”以後的時代，即社會主義的革命以後的時代。我們都曉得，那時候的“國家”底政治形態是最完全的民主主義，但在無恥地歪曲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者之中却沒有一人能想到：在昂格思這就關係於民主主義底“就眠”及“死滅”。這話一見地好似很奇怪的。但是這祇是對於沒有熟考過民主主義也是一國家，而國家一經消滅，民主主義也就馬上歸於消滅的人纔“不能理解”。祇有革命能夠“揚棄”資本家的國家。國家即自 即最完全的民主主義，却祇能“死滅”。

第四，昂格思在他的‘牠(國家)是自己死滅’的有名的主張之上即添加一個具體的說明：這原理不但與無政府主義者相對立，同樣地亦與機會主義者相對立。在那裏，昂格思劈頭地推出那向機會主義者所指示的，從“國家底死滅”底綱領抽出來的，結論於前景。

我們可以打賭地說：聽過或讀過這國家底死滅的一萬人中的九千九百人，大抵是不曾知悉，或者想都不曾想起：昂格思從那個綱領所抽出的他的斷案不是為反對無政府主義者而設的。而比殘餘的百人之中的九人的確不知道“自由的人民國家”究竟是什麼東西及向這個標語的鬥爭 為什麼就包含着向 機會主義者的攻擊。這樣地人們寫着歷史！這樣地這偉大的革命的學說在不知不覺之中變成了適應於支配的布爾喬亞階級了。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斷

案一千回地被反覆磨擦，被化於模稜無角，儘可能地被釘入於腦袋之中而保持着成了偏見之堅固性。反對機會主義者的新案却被文飾隱蔽而終被“忘却乾淨了”。

“自由的人民國家”是七十年代的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者底綱領的要求，亦是廣泛地傳布了的口號。這個口號除了民主主義的本質之小布爾喬亞的，誇大的釋義以外，沒有什麼政治內容。昂格斯因鼓勵上的理由暫時地雖允認了這個口號，但這不過在於這樣的範圍以內，即在合法的新聞上這句口號如能表示出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之意義，但這口號是機會主義的，因為牠不但是有辯護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之意義，而且表白出對於社會主義之批評各國家一般之沒理解。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在資本主義底下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特是一個最良的政治形態，所以我們贊成牠，但決沒有權利去忘却：在這民主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中，人民的運命依然是勞銀奴隸。更且：一切的國家對於被壓迫階級是“特殊的抑壓權力”。所以一切的國家都是不自由而且是非人民國家。馬克思及昂格斯在七十年代曾向黨的同志反覆地地說明了這個意思。

第五，誰都能想到的關於考察國家底“死滅”之昂格斯底同著作中有一段關於暴力革命的意義之議論。牠的任務之歷史的評價，在昂格斯，變做對於暴力革命底真實的讚美歌。誰“也不會想起”這段文字；今日的社會主義的黨是沒有習慣去說及這思想的意義的，不，更且沒有祇去思索這思想的慣習呢。向羣衆底日常的宣傳及鼓勵之中，這些考察並沒扮演過什麼腳色。但是，這些考察却與國家